

4803

312

鲁迅

《集外集拾遗补编》

(1928—1936)

资料选辑

下 卷

.97

I210.97

103

2:2

鲁 迅

《集外集拾遗补编》

(1928——1936)

资 料 选 辑

下 卷

103

山 东 师 范 学 院
《集外集拾遗补编》注释组

一九七九年八月

A 845333



《引玉集》广告

鲁迅谈《引玉集》

我对于木刻的介绍，先有梅斐尔德（Carl Meffert）的《士敏土》之图；其次，是和西谛先生同编的《北平笺谱》；这是第三本，因为都是用白纸换来的，所以取“抛砖引玉”之意，谓之《引玉集》。但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而且，丑角也在荒凉中趁势登场，对于木刻的介绍，已有富家赘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笔了。但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引玉集》后记（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日）

我想送点日本纸给俄国木刻家，请费神代买一些。纸名如下：

西之内（白色） 一百张

鸟之子（白色） 一百张

又，我想就托纸铺用挂号径寄俄国会简便些，所以将难写的姓名地址一并奉上，请代贴一下。

我用纸交换木刻画。不过画会不会寄来，还是一个问题。倘能来，则又可在夏天或秋天开个展览会。

致内山完造信（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鲁迅书信集》下卷1095页

那些木刻，我很想在上海选印一本，介绍于中国。

致曹靖华信（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鲁迅书信集》上卷 422 页

我有苏联原版木刻，东洋颇少见，想用珂罗板介绍于中国，而此地印费贵，每板三元，记得先生言北平一元即可，若然，则四十板可省八十元，未知能拨冗给我代付印否，且即在北平装订成书。倘以为可，他日当将全稿草订成书本样子，奉托。

致郑振铎信（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日）

《鲁迅书信集》上卷 431 页

故宫博物馆之版虽贵，但印得真好，只能怪自己没有钱。

致郑振铎信（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鲁迅书信集》上卷 448 页

至于得到的木刻，我日日在想翻印，现在要踌躇一下的，只是经济问题。但即使此后窘迫，则少印几张就是，总之是一定要介绍。所以可否请兄就写信到那边去调查一点，简略的就好，那么，来回约两个月，明年二月便可付印了。

致曹靖华信（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鲁迅书信集》上卷 450 页

我所收集的苏联木刻，一共有八十多张，很想选取五十张，用玻璃版印成小本（大者不多，只能缩小），则于学者

可以较展览会更加有益。现已写信到日本去探听印费（因为他们的制版术很好），倘使那价目为我力所能及，大约明年便当去印，于春末可以出版了。

致吴勃信（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六日）

《鲁迅书信集》上卷 456 页

下午编《引玉集》讫。

日记（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鲁迅日记》下卷 872 页

寄三明印刷厂《引玉集》序跋。

日记（一九三四年二月七日）

《鲁迅日记》下卷 874 页

午后编《引玉集》毕，付印。

日记（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

《鲁迅日记》下卷 877 页

木刻集不久可以出版，拟寄赠作者，那时当分两包，请兄分写纸两张（五人与六人）寄下，俾可贴上。作者是 D·I·Mitrokhin, V·A·Favorsky, P·Y·Pavlinov, A·D·Goncharov, M·Pikov, S·M·Mocharov, L·S·Khizhinsky, N·V·Alekseev, S·M·Pozharsky, A·I·Kravchenko, N·I·Piskarev。

致郑振铎信（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

《鲁迅书信集》上卷 544 页

上午洪洋社寄来《引玉集》三百本，共工料运送泉三百四十元。

日记（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鲁迅日记》上卷 888 页

木刻集已印好了，而称重量，每包只能容四本，所以寄与作家的书，须分四包了，每包三本（其中之一是送VOKS的），请兄再一费神，另再四张寄下为祷。至于寄书人，则书店会打印章的。

致曹靖华信（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鲁迅书信集》上卷 553 页

又木刻集一本，则新出，大约中国图版之印工，很少胜于这一本者，然而从东京印来的，岂不可叹。印了三百本，看来也是折本生意径，此后大约不见得能印书了。

致王志之信（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鲁迅书信集》556 页

新俄木刻集已印成，今日寄奉一本，想可与此信同时到达。此系从东京印来，每本本钱一元二角，并不贵，印工也不坏，但二百五十本恐怕难以卖完，则折本也必矣。

致郑振铎信（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鲁迅书信集》上卷 556 页

盖中国艺术家，一向喜欢介绍欧洲十九世纪末之怪画，一怪，即便于胡为，于是畸形怪相，遂弥漫于画苑。而别一

派，则以为凡革命艺术，都应该大刀阔斧，乱砍乱劈，凶眼睛，大拳头，不然，即是贵族。我这回之印《引玉集》，大半是在供此派诸公之参考的，其中多少认真，精密，那有仗着“天才”，一挥而就的作品，倘有影响，则幸也。

致郑振铎信（一九三四年六月二日）

《鲁迅书信集》上卷 566 页

《引玉集》印三百部，序跋是在上海排好，打了纸板寄去的（但他们竟颠倒了两页），印，纸，装订，连运费在内，共三百二十元（合中国钱），但印中国木刻，恐怕不行。

致郑振铎信（一九三四年六月二日）

《鲁迅书信集》上卷 566 页

《引玉集》并不如来函所推想的风行，需要这样的书的，是穷学生居多，但那有二百五十个，况且有些人是我都送过了。至于有钱的青年，他不需要这样的东西。

致杨霁云信（一九三四年六月三日）

《鲁迅书信集》上卷 569 页

这回的《引玉集》目的是在供给学艺术的青年的参考，所以印工不能不精，一精，价钱就贵，本钱就每本一元二角，倘印得多，还可以便宜些，但我没有推销的本领，不过，只要有人翻印，也就好了。现在又在去信讨取大著作上的木刻插图，但有没有不可知，以后有没有力量印也不可知。

致韩白罗信（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鲁迅书信集》上卷 606 页

新得的木刻，现在有约四十张，选起来，可有三十余张，恐怕还有寄来的，那么，明年可出二集了。

致曹靖华信（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
《鲁迅书信集》上卷 640 页

木刻第一集全卖完了，又去印再版二百部，尚未印成。二集尚未计划，因为所得只有三个人的作品，而同氏的又系短篇小说插画，零零碎碎，所以想再迟一下。

致曹靖华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鲁迅书信集》下卷 710 页

我在再版《引玉集》，因为重排序文，往往来来，从去年底到现在，才算办妥，足足四个月。一个人活五六十岁，在中国实在做不出什么事来（但，英雄除外），古人之想成仙，或者也是不得已的。

致曹聚仁信（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
《鲁迅书信集》下卷 795 页

再版《引玉集》印成寄至，计发卖本二百，纪念本十五，共日金二百七十元。

日记（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鲁迅日记》下卷 957 页

《玄武湖怪人》按语

鲁迅谈《玄武湖怪人》按语

奉上剪报一片，是五月十四日的《大美晚报》。“三个怪人”之中，两个明明是畸形，即绍兴之所谓“胎里疾”；“大头汉”则是病人，其病是脑水肿，而乃置之动物园，且谓是“动物中之特别者”，真是十分特别，令人惨然。随手剪寄，不知可入《古香斋》否？

致陶亢德信（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
《鲁迅书信集》上卷546—547页

以敝“指谬”拖为《古香斋》尾巴，自无不可，但署名希改为“中头”，倘嫌太作，则“准”亦可。《论语》虽先生所编，但究属盛家赘婿商品，故殊不愿与之太有瓜葛也。

致陶亢德信（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八日）
《鲁迅书信集》上卷547页

上午寄陶亢德信。

日记（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
《鲁迅日记》下卷887页

得陶亢德信，即复。

日记（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八日）《鲁迅日记》下卷887页

《〈母亲〉木刻十四幅》序

鲁迅谈《母亲》木刻画及其序

复韩白罗信，并寄《母亲》插画印本十四张，引一。

日记（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鲁迅日记》下卷 898 页

上午得韩白罗信并翻印《母亲》插画一本，午后复。

日记（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

《鲁迅日记》下卷 908 页

《母亲》的插图没有单张的，但从一本完整的书里拆出来，似乎也可惜，因为这书在中国不到三百本。我这里有一本缺页的，已无用处，所以将那十四幅拆下，另封托书店寄上了。至于说明，我无法写，因为我也不能确知每图是针对那几句，今但作二百字介绍，附上，用时请觅人抄一抄。

致韩白罗信（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鲁迅书信集》上卷 607 页

高尔基回忆列宁对《母亲》的评价

在这一年以前，我没有会见过列宁，也没有如我所应当地读过很多他的著作。但是我读过的东西，特别是那些直接

认识他的同志们的热情的叙述，都以巨大的力量吸引我倾向于他。当有人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用锐利的眼睛审视着我，带着老相识的语调玩笑似地说：

“你来了，这好极啦！你不是喜欢打架吗？这里将要大大地打一场架。”

我所预料的列宁并不是这样。我觉得他缺少着什么东西。用喉音卷着“P”把两手交叉地插在腋下，他很洒脱地站着。总之，这整个人是太朴素了，在他身上感觉不到有丝毫“领袖”的风度。我是一个文学工作者。这个职业逼着我注意琐细的事情，这个义务已经变成习惯了，有时候是一种讨厌的习惯。

当我被“引见”普列汉诺夫的时候，他双手交叉在胸前挺立着，严厉地、有点厌烦地看着我，好象一个对于自己的职务感到厌倦的教师看着一个新学生一样。他向我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的应酬话：“我是你的天才的崇拜者。”除此以外，他不曾说过什么令我忘掉不了的东西。在代表大会整个期间，不管是他也好，不管是我也好，都没有想作“知心”的谈话的愿望。

但是这个秃头的、用喉音卷着“P”的、结实的、强壮的人，一只手摸着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另一只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闪亮着他的一双灵活得惊人的眼睛，立刻就谈到《母亲》这本书的缺点，原来他已经从拉得斯尼可夫那里把手稿拿去读过了。我说我是赶忙地写成这本书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说明为什么赶忙，列宁就赞成地点了一点头，自己把这个原因说明了：我赶忙得很好，这是一本必需的书，很多的工人都是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

一读《母亲》，一定会得到很大的益处。

“一本非常及对的书。”这是他对我的唯一的然而极其珍贵的赞语。接着他郑重其事地询问我：《母亲》是否译成外国文，俄国和美国的检查机关把这本书删改了多少；等到他知道了作者在被通缉的时候，他首先皱着眉毛，接着把头仰起，闭上眼睛，发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大笑；他的笑声吸引了工人们，走过来的好象是弗拉尔斯基和其他两三个人。

（高尔基《列宁》，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题目为本书编者所加）

自 传

鲁迅三篇《自叙传》校释 (节 录)

——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六周年

张 向 天

鲁迅先生在世时，亲手自作的《自叙传》一共有三篇。

第一篇为俄文译本《阿Q正传》所作的《自叙传略》，作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鲁迅日记》这一天留有这样的记事：“夜作《阿Q正传序》及自传略。”这篇《自叙传》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三十一期，后收入《集外集》。为叙述方便，简称为“传一”。

第二篇“自传”作于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六日，简称“传二”。这篇“自传”不见于《鲁迅全集》，王冶秋一九四七年出版的《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一书，取这篇“自传”列于卷首。一九五七年八月“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印的《鲁迅图片集》，也把这篇“自传”列于图片之前。

第三篇“自传”无写作年月，现收入新版《鲁迅全集》第七卷，据卷后“注释”说：“本篇是应国外的翻释者的请求写的，约作于一九三五年间，没有发表过，据原稿录出。”这份“原稿”，现收入一九六〇年九月第一版的《鲁迅手稿选集》里，据文中所叙各点推定，当作于一九三四年三月间，简称“传三”。

现将这三篇“自叙传”分别录出：

(原文略)

谨案：一、鲁迅先生的自传三篇，都是以传一作为基础而渐次随着自叙传写作年时而有增添。三篇中，凡叙早年历史如生年、籍贯、家庭、家境、家道变故以至南京求学，派赴日本及回国任教、入教育部等各项，均大致相同。而且叙弃医提倡新文艺一事，传二较传一稍详切。

二、传二、传三都特别强调了一九二六年同北洋军阀段祺瑞及其走狗的斗争现实。传二称“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而未举名；传三则直白揭出反动帮凶“陈源”之名，“告密”的就是这个败类。其告密奸计，是先诬鲁迅为“土匪”，其次煽动北洋政府去逮捕。

陈源（即西滢）当时有如此凶险恶毒的话：“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叫人有些恶心的吧了。现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号了。好一个‘土匪’。”（《不是信》）

鲁迅在《可惨与可笑》一文中，对陈源的毒计曾有揭露。鲁迅说：“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宣统年间用‘革党’，民二以后用‘乱党’，现在自然用‘共产党’了。其实去年有些‘正人君子’称别人为‘学棍’‘学匪’的时候，就有杀机存在，……在‘棍’‘匪’字里，就藏着可死之道的。”（《华盖集续编》）

这事在鲁迅给友人的书信中也有透露。一九三一年三月六日给李秉中信中说：“五年前（即指一九二六年——引者，下同）有人将我名开献段公（即北洋军阀段祺瑞），煽

其捕治时，遂孑身出走，流寓厦门。”（《鲁迅书简》页十七）

又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致李秉中函中说：“从去年以来，我因为喜欢在报上毫无顾忌地发议论，就树敌很多，章士钊之来咬，乃是报应之一端，出面的虽是章士钊，其实黑幕中大有人在。”（同上书页八）

三、传二虽写于一九三〇年五月，但对国民党大叛变，流血清党一事，只字未提；而传三则从“不久就清党”以下，历述国民党的流血杀人，以及残酷的压迫人民、践踏人民集会结社自由的诸罪行。

在传三中鲁迅详记了加入“三盟”的事实。鲁迅先生是在一九三〇年一月，加入自由大同盟；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联正式成立，鲁迅为重要发起人之一；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鲁迅交纳会费，正式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员。

四、传二、传三结尾处都记述了出版的作品。传二所称的“一本论文”，指《坟》论文集。“一本回忆记”，指《朝花夕拾》。“一本散诗”指《野草》。“四本短评”即《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

传三所说的“短评八本”，即除去传二所记的“四本短评”外，再加上一九三二年九月印成的《三闲集》、同年十月印成的《二心集》、一九三三年十月印成的《伪自由书》，和一九三四年三月印成的《南腔北调集》，合共八本。

五、传三是从未发表过的一篇自叙传，并无写作年月。不过据下面所引述资料，其写作年月是可以推定的。

首先鲁迅的第八本短评《南腔北调集》印成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则这篇《自叙传》的写作时间就不会早过这个时期。

其次文中说：“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被国民党所禁止。”这是指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委员会第三十号密令查禁进步文艺作品一百四十九种的事。上海各报纸公开披露这一禁书新闻则为三月十四日，则据此可以推知鲁迅写作传三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时期。

鲁迅作品被禁的，翻译有：《果树园》（现代书局）、《高尔基文集》（光华）、《现代新新文学的诸问题》（大江）、《艺术论》（大江）、《文艺与批评》（水沫）、《文艺政策》（水沫）、《毁灭》（大江）共七种。

创作有：《鲁迅自选集》（天马）、《三闲集》、《而已集》、《伪自由书》（均北新）、《二心集》（合众）共五种。

另有以下可作助证的重要资料：

一九三四年三月六日给姚克信说：“上月此间禁书百四十九种，我的自选集在内。我所选的作品，都是十年以前的，那时今之当局，尚未取得政权，而作品中已有对于现在的‘反动’，真是奇事也。”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八日致增田涉：“我一九二四年后的译著，全被禁止（只《两地书》与《笈谱》除外）。”

六、三篇自叙传写作目的，除传一知道是为了《阿Q正传》的俄文译本所写的以外，传二可能是应了史沫特莱女士之请要在国外报刊上发表之用。鲁迅和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往来是始于一九二九年岁暮。这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鲁迅日记》有“下午，史沫特列女士、蔡咏裳女士及董绍明君来。……史女士为弗兰孚德通讯员，索去照相四枚”的记

事。此后于一九三〇年鲁迅和史女士的交往愈密，《日记》里记与史沫特莱往还有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五日、二月十日、三月二十七日、三月二十八日、五月六日等多条，据此推知第二篇《自叙传》是为史沫特莱在外文报刊上介绍鲁迅生平而作。

第三篇自叙传是应美国人办的《中国论坛报》编辑伊罗生之请而作的。一九三四年伊罗生有意出版一部英译的中国新文艺作品，定名《草鞋脚》，并托鲁迅和茅盾二人协助选出包括鲁迅以及其他新作家的文艺作品，并在每个作家之后附志小传。鲁迅的第三篇自叙传便为此而作。《草鞋脚》也选了楼适夷的一篇作品，鲁迅特为此写信向楼炜春征询楼适夷的生平略传，说：“适见译成英文小说，即《盐场》，并非登在杂志上，乃在一本中国小说选集名《草鞋脚》者之中，其书选现代作品，由我起至新作家止，共为一书，现稿已寄美国，尚未出书，待印出后，当寄阅也，希便中转告。”

（张向天著《鲁迅作品学习札记》，
香港上海书局一九七五年一月初版）

草 鞋 脚

（中国短篇小说集 1918—1933）

目 次

小 引	鲁 迅
序 （写于1973年4月10日）	伊罗生